

論《國史大綱》與歷史發展¹

一 錢穆先生的歷史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錢穆先生從北平撤退至西南大後方，此時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時節，錢先生手頭資料不充足，地處僻陲的情況下完成《國史大綱》。時至今日，很多學者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形容錢穆誓承接傳統文化的氣魄。筆者有幸畢業於錢穆先生開辦的新亞研究所，自涉獵中國歷史開始，已是以錢穆先生的作品作引導。本文不獨為錢先生搖旗吶喊，且滿懷對家國之感情，在這史學發展至歧路的情況下，再加思考。

《國史大綱》幾成為亡國者的作品，若說此書的重要，我會以司馬遷完成《史記》的心來形容此書：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臍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²。

上列每部流傳後世巨著的作者都是處身憂患逆境中，幾置於喪命無助之境，才能完成偉業。錢先生處身的國家環境，正正是存亡之際。他寫《國史大綱》時的矛盾：「

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指摘，嚴其中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燄，而為國史前途之

¹ 本文內容，部份取自作者已發表的其他論文，讀者留意。

² (漢)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64)卷六十二，頁 2735。

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³

錢先生希望振奮國人對國史的興趣，從中了解中國為何有當時的國勢及社會現象。他推崇司長光，退而著作《資治通鑑》，司長光政治上不能發展自己的抱負，就以著史將自己對家國的期望與見地，表達出來，可謂費盡心神，無非重新興起國人對國家的信心。錢先生說：「史學在中國，一向成為一支盛大光昌的學問，中國人一向看重史學，可謂僅次於經學。」⁴

幾千年的歷史，沒有間斷，《國史大綱》貫徹中國各方面整體的發展與變遷，中間闡述其變遷的原因，發展的利弊，可謂別具心得卓見。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說：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網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⁵

國史之重要，關乎國亡家破，不可不慎。當年出版，遇到阻礙，有論者認為偏頗，偏重愛國思想，殊不知生死存亡之間，些種喚起國民對中國的信心，是難能可貴，是真知灼見。

王晴佳曾在《台灣史學五十年》：

1960年代以後，錢穆在台灣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影響也日漸顯著，其突出標誌就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從那時以來常被各校歷史系用作大一的通史教

³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頁33。

⁴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台北：學生書局，民66），頁14。

⁵ (清)龔自珍：《定盦續集》（北京大學藏同治刻本，有錢塘吳煦序）卷二〈古史鉤沉論二〉，頁3。

材。對那些初入史學之門的莘莘學子來說，錢穆的文字顯得有些古奧，對書中所闡述的微言大義和時世背景也不甚了了，但作為他們進校以後所接觸的第一本專業歷史書籍，其思想影響可以說是潛移默化、細長久遠。...

錢穆《國史大綱》成書於抗戰期間，自出版即佳評如潮，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說此書是當時所有通史著作中創見最多的，1947年嚴耕望出版《治史答問》，在書中稱讚此書，「章節編製與一般通史書迥異，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精悍絕倫」，而此書在戰後台灣的歷史系課程，特別是在中國通史課堂上，《國史大綱》仍是重量級的讀物，延續至今，依然如此。⁶

《國史大綱》是台灣入讀大學第一本對中國歷史全面介紹的書籍，嚴耕望先生稱讚是「內容尤多警拔獨到處，往往能以幾句話籠照全局，精悍絕倫」。

錢先生曾擔憂中國歷史如何走下去？他曾問章太炎：「現在是廿五史，下邊該怎樣？」章太炎沒有答。錢先生說自《尚書》後有《春秋》，自《春秋》後過約一千年有《史記》，自《史記》後二千多年，從沒間斷，原因在哪？中國人！應好好思考此問題⁷。中國人歷史的路，又該如何走下去？

本文討論錢穆先生對中國歷史的信念，及闡釋錢先生所說政體三級演變：由封建而躋統一；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的政府，而為士人的政府；由士族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等三個方向討論中國歷史發展。此三項，實具中國歷史的發展獨特形式，亦是搏成現代中華民族的原因。

⁶王晴佳：《台灣史學五十年》(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⁷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星星出版社，年缺)，頁 60-61。

二 讀國史的信念與認知

錢先生說國人要對國家產生感情，首先必須認識本國歷史，因認識而產生感情：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⁸

我們對過往的光榮歷史，悲傷歷史要同樣有感覺，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錢先生說：「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經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人生整個已往經驗。」⁹因此，歷史就是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間切斷，我們的今天，必定與昨天有關。¹⁰沒有了歷史知識，就沒有了民族生命。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說出國史的重要¹¹：

1.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2.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⁸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25。

⁹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香港：人生出版社，年缺)，頁 2。

¹⁰ 同上註，頁 5。

¹¹ 錢穆：《國史大綱》，頁 1〈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3.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譏。)
4.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錢穆先生鄭重的說，國人必須對國史有基本認識。讀中國歷史，要對國家歷史有溫情，有尊敬的心。每個歷史時期也可能出現暴政或外來民族的壓迫，都有著他的時代因素，我們不應因此而對中國幾千年文化而產生懷疑，甚至厭棄。現時處於弱勢的國家，不等於以往的歷史毫無價值，反之，要思考古往今來變遷的因素。不可因此而對古史譴責或自譏。倘國人對本國歷史有認識，這亦是國家興起之始。筆者自少聽老師說歷史故事，每每對古代聖賢悠然生尊敬之心。

其次，是要分清楚「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的分別。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記載此活動的材料是歷史的材料，而不是歷史的知識。錢先生強調：

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

所欲知。」(見《國史大綱》·引論)

後來的學者必須從歷史材料中，尋求歷史知識，若放棄歷史材料，而妄稱史識，無疑癡人說夢。結論是「史識」必從「史料」始。讀歷史而沒有史識，若只在材料上打滾，是本末倒置。

錢穆先生分析中國歷史的特色：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

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鑒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

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復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并世固當首屈一指。¹²

¹²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1。

中國歷史特色有三：悠久、無間斷、詳密。這是本國史彌足珍貴之處，亦是有異於他國歷史的不凡處。故此，研究歷史是求其「異」及求其「同」。

「求其異」是從歷史的狀態及特性而知道其變之所在，而看出整個文化的動態。再從此動態的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求其同」是尋找不同時代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

¹³亦可謂民族發展的命脈。

中國歷史人事之間，以人為主，事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¹⁴。人有賢奸，事有褒貶，褒貶乃中國歷史之要綱。撰寫歷史，就負起評定人物的責任，亦是定立民族道德方向的推動者。(宋)鄭樵撰《通志》要地下無冤人，(宋)歐陽修評馮道是「其可謂無廉恥者矣」等，都是為社會的道德要求作前導。

歸納學習歷史的重要性，最少有下列三種社會功效：

(一)崇敬本國歷史偉人。我們從歷史認識到偉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等，他們的思想作品令人沈吟低思，開啟我們腦內多少疑難之門。看看百夷、叔齊，至死不食周粟，不是固執，而是我怎能原諒滅了我國家的民族？不管你的原因是如何的高遠，如何的「弔民伐罪」！單單這一節歷史，已是道德與現實之爭，這裡就是道德教育。刺秦荊軻、斷舌顏昕、碎齒張巡，還有上疏明世宗的海瑞，正氣直趨這墮落皇帝，不得不抱頭而痛。沈鍊當眾罵嚴世藩，雖然落得人亡家傾，但士人傲骨，處處可見。清代燒車御史謝振定，剛氣迫人，惠及子嗣。徐錫麟的副心，秋瑾的斷頭，每個歷史故事都令我們低迴歎息，卻又重凜節氣。他們是我們的先輩，是我們民族的英雄。的倘若這些前賢，是我們後輩的典範，又何愁不出現為國為民的來者。

(二)定立道德價值觀。傳統是「立德、立功、立言」。道德價值是全個民族的依持點，亦是民族精神靈魂的所在。立己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道德價值，把整個民族連繫，就是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是否偉人？是考慮其行為影響之深、遠及廣。能否為大部份人謀取幸福，為百世定太平？歷史教學所選取人物的行為，就是教育整個民族道德價值的關鍵，不可輕忽。我們不能崇拜秦始皇，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民族，而是自己的家族千秋萬世的統治。鐵木真以屠城作掠奪城邑的恐嚇手段，以屠殺滿足自己的英雄感。這些人，能算是英雄嗎？

¹³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1。

¹⁴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出版社，2002)，頁 113。

(三) 為國家民族，因應時代變化，設定制度與改革。政制的改革、經濟的變遷、選仕的方式等等，若一成不變，就會出現鴉片戰爭後，國家受盡欺凌的情況出現。現代讀史者，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為國家尋求可行的出路。

三 由封建而躋統一

中國歷史自黃帝傳說始，有四千六百多年，當然可以用「悠久」來形容。由封建至統一，是趨勢。西周封建本是耕稼民族之拓展，與游牧民族本無衝突，因兼併出現，游牧民族乘機侵擾。霸主之出現，除維護周天子顏面外，是穩定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宗法封建，漸漸趨向戰國時的新軍國，軍功亦代替貴族的專政。論者往往以「專制」評論中國政體，卻不知中國自秦漢以來乃非一家一姓之力能專制：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¹⁵

錢穆先生認為，秦以前，可以用「封建統一」來形容，而秦以後，可以說是「郡縣統一」。¹⁶政權開放，平民弟子可因才能、軍功，晉身統治階層。同樣，社會上的井田徵稅方法，轉為「履畝而稅」。春秋時期的出現，文化上是一大成就。外交上文雅風流，戰爭中仍重人道、講禮守信。儒、墨兩家之興起，影響深遠。孔子從歷史的觀念出發，追隨文王、周公的禮法。從人道的觀念出發，提出天命、性、仁、孝、忠恕等觀念。墨家在理念上是反對儒家的禮、樂奢侈觀念。同時，亦反對儒家的其他觀念，提出「兼愛」、「天志」等理論。根據錢先生的理解，「以下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墨之範圍」¹⁷。

¹⁵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

¹⁶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頁 20。

¹⁷ 錢穆：《國史大綱》，頁 103。

錢穆先生說此演變，於秦漢已完成。此統一大業，亦非常壯烈。見於春秋的國家名字約五十多國，若以左傳紀錄計算則約百七十國。從列國內亂，戎狄入侵，如此則各地戰爭是無時無刻的發生。從戰國七雄，至秦統一天下，整個民族多在水深火熱中。

戰國二百四、五十年的歷史，出現一次貴族統一局面，始皇二十六年(元前221)滅六國而統一。卻在短短十五年的統治期，由平民出身的漢高祖，開創史無前例的平民稱帝。西漢劉氏執政二百二十一年，新莽居攝十八年，再由劉氏掌政九十六年。

秦的統一，劃定了中國的基本版圖。其有功於後世者，廢封建、行郡縣、墮城郭、夷險阻、築馳道、建長城。最重要是統整各地有異的制度、文化、風俗，使中華民族形成初步面貌。錢先生認為，秦乃貴族敗氣的延續，是進入平民治國的過渡期。¹⁸

漢之統一，制定稅、役、賦、貢的規模。農民出現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繼而產生與統治者的臣屬關係，對國家又生義務感。

在此特別提出，封建至統一的歷程。封建，在中國歷史上最簡單的解釋是「封疆建土」，即分封。戰國時已出現郡縣制，秦統一，實行郡縣制。漢初立國，為便利統治，推行郡國制，文景以後，基本上地方封國已無實權。

試討論中西封建的不同。至於西方封建，主要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時期。上古史是希臘和羅馬時期，中古史是封建時期，近代史是現代國家興起以後。部份學者很籠統的說中國是封建社會，錢穆先生曾撰文闡釋。「封建」是日本人用來譯 feudalism 的，是馬克思用 feudalism 描述中世紀的歐洲。若據此來描述中國社會的發展，未免不太準確，往後很多學者更改原始「封建」的含義來解釋中國社會，例如將戰國至清代全稱古代封建。錢先生在《國史大綱》再申明此謬誤：

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園，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

¹⁸錢穆：《國史大綱》，頁 127：「秦之統一與其失敗，只是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中間之一個過渡。」

弗 睹，暗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¹⁹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可稱為「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或四民社會」²⁰，更闡明「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言『封建』」。 ²¹更實言中國行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數千年未變。西方近代是民主政治，中國自秦迄清是皇帝統治，若硬說這是「專制政治」，未免強將西洋人的分類，加入中國歷史內。²²

筆者數十年前亦因錢穆先生之言，於報章撰文分析東西方封建之不同。所得結論是歐洲自封建後，歐洲大陸未見統一，單以日耳曼民族來說分別成為挪威人、丹麥人、瑞典人、冰島人、德意志人、奧地利人、瑞士人等等。但中國自秦漢以後，基本上是統一的國家，足以證明兩者的發展完全不同。中國史最突出的一點是，侵略中原的外族，漸漸融人中國，成為中國人。

四 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的政府，而為士人的政府

錢先生說士人政府完成於東漢，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有關士人政府的建立可參看《國史大綱》〈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的演進〉。秦、漢立國均以軍功為獎賞標準，成為政府的上層統治者。其次的官僚，多以郎、吏出任。無疑，新興的貴族階層仍是以出身為依據，有蔭任，指二千石以上，

¹⁹ 錢穆：《國史大綱》，頁 6。

²⁰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東大出版社，2008)。

²¹ 錢穆：《國史大綱》，頁 21。

²²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頁 26。

視事三年可廕子一人為郎；貲選，指家貲滿五百萬，可為常侍郎；特殊技能，指戲車、善御、文章見用，地位多不被重視。

漢代的文治思想肇端於賈誼，他提出闡揚文教，針對時弊施政。其議論是從法律刑賞而轉向禮樂教化，由法而轉向儒家思想。

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士人政府之方有五，一是立五經博士，令學者從方技雜流漸次轉向從事研究政治、歷史的方向。二是公孫弘議立博士弟子員，此開文學入仕的途徑。三是郡國長官察舉屬吏之制度實行，建立士人有機會進入中央體制之途。四是禁官吏營商，裁抑兼併。五是打破封侯拜相之例，減低由一階層獨佔高位的局面²³。自此以後，士人政府出現，公卿朝士，名儒輩出。錢先生對此現象的評價是「自此漢高祖以來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素樸的農民政府，現在轉變為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的、有智識的士人政府，不可謂非當時的又一進步。」²⁴錢先生對漢武帝定立的選舉制度，有如此的見解：

中國自漢武帝以後便變了。當時定制，太學畢業考試甲等的就得為郎，如是郎官裡面，便羈進了很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卻不就是貴族子弟。至於考乙等的，回到本鄉地方政府充當吏職。²⁵

漢代選舉之途有詔舉賢良方正，不定期煮及舉孝廉。應舉者，須參加中央考試，貴族與郡縣官吏均可推薦人材。如此，由中央至地方，均由知識分子治理，成就了士人政府，亦是大規模文人治國之始。

五 由士族門第再變為科舉競選

由士族門第變為科舉競選，錢先生認為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秦漢以軍功為官，秦火後，平民任職政府，要以吏為師。漢代士人政府形成，是造就社會上以儒家道德為依歸的社會風氣。然而，此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之關係，逐漸建構出門第制度。錢先生認為士人政府在社會上的勢力表現在「清議」

²³ 錢穆：《國史大綱》〈第八章：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頁 144-147。

²⁴ 錢穆：《國史大綱》，頁 149。

²⁵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3。

外，更重要的是構成「門第」。經學入仕，造成累世公卿的出現，鞏固了士族的勢力。地方察舉失去客觀標準，容易營私，請託報恩，層出不窮。錢先生形容此情勢，為變相的封建。

魏晉時，因察舉制度之逆轉，取而代之是「九品官人法」。此法當為權宜之法，初行尚有可取處。地方士庶可直求出仕中央，升遷之權操於中正的「品狀」。門第之勢已成，再立九品中正制，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高門望族，歷世為高官，寒庶則無寸進之途。繼之而學校與考試制度頹廢，中央無任人之權，太學如何能進才。錢穆亦謂此時期是變相的封建勢力。然而，門第自身力弱，以南朝士族為例，既不能奮勇對抗異族入侵，也不能重整王朝，推陳出新。南朝侯景之亂，可謂盡掃門第之氣數。

科舉設於隋代，隋文帝於開皇七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再設「進士」和「明經」科，為後世所沿用。唐代選仕有三途：生徒、鄉貢、制舉。所謂「制舉」是無定期的，而州、縣貢舉卻每年一次，科目殊豐，除秀才、明經、進士外，又設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等。由於科舉制影響中國往後過千年的選仕制度，故特補上定立制度時的資料說明，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雜記〉記：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²⁶

所謂「貢舉」，指貢人與舉人二事。貢人指各州每年依規定貢上中央的應

²⁶〔唐〕王定保：《唐摭言》（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唐摭言>〉），瀏覽日期：2020年12月19日。

考者，即所謂「鄉貢」。舉人有兩種情形，一是別敕令舉，一是官學（包括中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州縣學）學生每年呈報尚書省應考者。一般來說，唐代科舉分常科、制科，常科每年舉行一次，制科是由皇帝決定舉行日期。這樣的選拔人才，錢先生認為此乃立國的大憲大法：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²⁷

此制的用意，是以一客觀標準，挑選社會上的精英，參與國家的政治，消融社會上階級之存在，令社會文化向上。此制培植人民對政治的興味及提高其愛國心，成為一般平民出身及進入中央統治層面的制度。科舉制成隋唐至清代，公平選仕的制度。不受地方官吏限制：

此外則地方官不再加以限制，即申送中央，由尚書禮部舉行考試。考試合格，即為進士及第。進士及第便有做官的資格了。至於實際分發任用，則須吏部之再考試。²⁸

²⁷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5。

²⁸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 55。

黃仁宇稱科舉制度「這種公開考試足以打破過去的世族壟斷。」²⁹同時，亦是平民預政的制度。過去千多年的科舉中，出現狀元七百多人，進士超過十一萬，不問出身，只問成績，是客觀與公平的選仕制度。錢先生據此，認為中國秦漢以來就有民主精神：

在中國史上，當封建制度之舊一統時代，即西周時代（下及春秋），早已有一種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散見於群經諸子...，即秦漢時代，而中國人之民主思想與民主精神乃次第實現而具體化，制度化，成為一種確定的政治標準。³⁰

此論在當代確是駭俗（錢先生語），他詳細解釋，約有兩端。第一是秦漢時代，王室已與政府對立。天子是皇室代表，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行責任制。錢先生舉例至宋代，闡明皇室行使王權，幾乎必須得到政府首肯才能實施。其二是官員的來歷，大體而言，除元、清兩代外，官員大都來自民間，故政府人員與王室關係，殊不深密，由何來君主專制？因此，錢先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傳統政治，既非君主專制，又非貴族政體，亦非軍人政府，同時亦非階級專政」³¹。錢穆先生指出：

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

²⁹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2000），頁 125。

³⁰ 錢穆：《文化與教育》（台北：東大圖書，1977），頁 108。

³¹ 同上註，頁 112。

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³²

自漢以後，以布衣入仕，官至丞相，實使民眾與政府逐漸接近。又補充說，由漢至唐，在選拔人才方面是平等公正，才能形成以民為主的國家。

試看漢代選舉，唐代考試，對全國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對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參加政府。一應賦稅法律等，亦是全國平等。此等規模，豈能與現代西方帝國之殖民地統治相提並論？

科舉，是公平的考試，可惜明以後以「八股」形式進行，使士人思想陷入窠臼，甚至有學者認為明是亡於八股。然而，此論是集中其考試內容，而忽略了考試制度。就算是現代社會，較公平的考選，還是考試。中國的選仕制度，基本上是人人合資格即可應選，這是「天下為公」的概念，中國士子，自然而然產生愛護感。³³

六 歷史發展與民族融和

中國以農立國，土地就是我國靈魂所在，中間包括倫理親情、慎終追遠、關懷桑梓等情操。周公立封建，在河南建東都，再向東發展，建齊、魯二國，使中原文化遠被。秦統一六國，派數十萬軍遠征南越，這些軍旅，混居於南

³²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

³³ 錢穆：《國史大綱》〈引論〉，頁 14-15。

方，成為客家人。東晉及南宋的北方文化南遷，搏成偉大的中華民族。我們經歷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暴政，但不因此而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孫中山推翻的，不是滿洲文化，而是帝制。從北到南，融和著同一文化體系，這就是整個民族的血緣關係。

一個民族之擴展與搏成，期間經歷之過程是極之痛苦。當中涉及民族自尊、固有道德傳統、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結合，種族的仇視與接納。記得若干年前，國內有學者提議將岳飛、文天祥等抗金、抗元之民族英雄剔出民族偉人之列。原因是他們妨礙了民族統一，很抱歉說一句，有這樣理論的人，誤盡蒼生。假若有一天，中國再受外國欺侮，我們反抗，就是妨礙地球統一大業嗎？是歷史罪人嗎？那當年的抗日英雄，是否妨礙中日友好關係的罪人？當時的地域觀，國家觀及民族觀，與現代的觀念已有出入。假設這樣的理論成立，我們對抗日本的入侵，是否成了罪人？道德教育就在歷史教學。滿洲人入關時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不能說不是民族仇恨，但滿洲人完全融入漢族文化，共稱中國人。現在的漢滿關係與數百年前相比，不能同日而喻。

再討論民族的發展。商紂暴虐，武王弔民伐罪，史書譽之為義戰。可是，史遷將伯夷、叔齊列入列傳第一。商紂雖然暴虐，但外國入侵，也絕不可能接受，最後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稱之為「義人」，並指出周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伯夷、叔齊就是以商為本位，周是侵略者，怎可以接受。

秦漢成大一統局面，張騫、班超經營西域。張騫成鑿空第一人，而班超領三十六人入鄯善國，用計擒殺匈奴使者，焚殺百餘人。又於疏勒國建立傀儡政權，使漢朝聲威遠播。史譽之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亦是以漢人為本位所寫的歷史。倘以國際視野而言之，則班超的行為，無異於行刺使節，干涉他國內政。當時的國家地域觀念，會因時代進展與民族的融和，逐漸形成新的概念。

五胡亂華期間，五胡虐殺不少漢人，是漢人與外族的一次大衝突。石勒於平城殲晉軍十萬、劉曜入洛陽，殺宗室士兵三萬多人。大小戰爭中，常出現滅族行為，動輒殺人以十萬計，逼使大量北方人口南遷。這一次的南北融和，是以鮮血和生命所促成，可以說是痛史。此時期，當以晉室為本位，五胡是入侵。日後五胡與漢族混和，是歷史的發展趨勢。這就是逢耀東先生說五胡亂華，屠殺漢人，但入主中原後，外族來侵，他們也保衛長城。

現代中國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由外族而至承認成為中國一份子，中間有幾多糾纏與戰爭。對國家產生感情，必先由認識開始，以國家為本位去看自己的歷史才引起感情。我們仰慕我國對外開墾者，我們崇敬抗拒外敵英雄烈士，我們景仰歷朝改革者，我們尊重道德學問舉足輕重的學者。

近人研究國史，必須重視歷史作品，贊揚有高度學術成就，影響深遠的著作及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柳詒徵、錢穆、傅斯年、顧頡剛諸先生等等，都是眾所周知的大歷史學家。原因何在？就是我們相信歷史能喚醒我們的民族

自尊，可以從過往的歷史中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去走的路。章太炎將之付諸行動，推翻滿清，「中華民國」的稱號就是出自先生手。其他學者的作品，別具深意，《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精神》、《古史辨》等等，讀者都要細味。內裡是指出中國歷史的重心、意義、及從古史中以求真的態度作研究。背後是要國民莊敬自強，尊重本國文化，對民族未來要有信心。

歷史解釋因果關係，給人類啟示。大部份歷史學家都相信歷史是面鏡子，能看出國家發展的路向與艱險。可惜的是，歷史不斷重覆。防微杜漸，見微知著，歷代均有大學問家，大政治家，為何政權會走向滅亡？是執政者的愚昧與自私嗎？一涉個人私利，國家就漸向滅亡。

七 歷史教學與道德

歷史教學在道德教育層面的重要性，以秦始皇為例，始皇為人所稱道的政策改革，包括西元前二二一年，結束戰國，使中國進入統一時期，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道路系統等，整理經濟與交通；修築長城、運河、馳道等，貫通南北，方便貿易運輸；擴大版圖，驅逐河套匈奴，南下平定百越，基本上完成中華民族的國家雛形，並以長城內外界定華夷之別。所以，有人認為，沒有秦始皇，就沒有後來的中國。

當然，沒有氣魄與幹勁，不能完成以上的功業。但一個偉大的領袖，是否只在於建設，而不是在於治國？一個偉大的領袖是否應帶領民眾安居樂業？始皇其他政績：統一後，每年徵發民夫四十萬修建長城；發民夫七十萬在渭河南岸興建阿房宮；《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國有「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還有是「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建驪山陵墓，歷時三十多年，每年動用民夫七十萬。

據推算，秦滅六國後，人口約在三千萬左右。有學者認為，當時始皇推展規模空前的大型建設，造就不少就業機會，類似後世以基建推展經濟。請不要忘記，秦朝是以農立國，九成以上民眾是以農業為生。我們作個假設：三千萬人中一半是女性，即剩下的男性勞動主力餘一千五百萬，如三分一為老人，不用，三分一為小孩，不用，那餘下可供勞力建設者，只餘五百萬人。如果，幾項大型建設，包括陵墓、長城、阿房宮，每年已動用約一百八十萬人建設。剩餘的三百二十萬人，要養活三千萬人，平均約一個農民，要養活十個人。請問：這個國家如何維持下去？漢初建國，人口約一千五百萬人，短短二十年，中國人口少了一千五百萬人。能說始皇是偉大嗎？

孟子說：「雞鳴狗吠，達乎四境」，其實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有家禽家畜的聲音，境內安寧，得到飽足。而不是實踐一些自以為驚天動地，泣鬼神的狂人意願，死千多萬人去建立自己千秋萬世的功業。

據司馬遷《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

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³⁴。這些是功業嗎？實在說，現在的 8851.8 公里的長城，大部份是明代建築。秦漢期間的長城，多隨時間湮滅。而明的長城，是由洪武至萬曆，經過二十多次的增建而成。不是個人好大喜功，無論死多少人都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殘暴行為。無論當時死傷多少，始皇的長城，都成廢業。蒙恬帶三十萬軍隊驅逐匈奴，蒙恬死後，匈奴又再次入境。一場大戰，竟然沒有理想的結果，政策之失誤，全由始皇一人所致。

史學家必然理解歷史趨勢，由封建至中央集權，是趨勢；由分治至統一，是趨勢。不管是秦始皇、趙武靈王、楚懷王等等，只要滅六國，就必然是大一統的王者，這也是趨勢。

柳詒徵說：「蓋嬴政稱皇帝之年，實前此二千數百年之結局，亦為後此二千數百年之起點，不可謂非歷史一大關鍵。惟秦雖有經營統一之功，而未能盡行其規劃一統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漢行之。秦人啟其端，漢人竟其緒。」³⁵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始皇為統一，建立規模。以國家長遠發展來說，功不可量，但他的出發點，不是國家，而是自己的家族。

領袖應有元素：是帶領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是一個狂妄建築家。若要給始皇下個結論，我只能說他是偉大的上市公司主席，偉大的家族領導人。他為自己的公司，不惜摧毀成千上萬的家庭，掠奪無數人的財產而自肥；他為自己的家族，不惜出賣上千萬的國民，維護本身家族利益，用現代用語，苟有利於其家族，不惜當漢奸；為求其家族千秋萬世，不惜殺上億中國人。很可笑是，中國部份嗜血歷史學者，發覺愈殺得人多，愈偉大，還可以找千種理由翻案！

賈誼說：「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³⁶始皇真是那麼偉大，又怎會是短命皇朝。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被推為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司馬遷曾言：「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

³⁴ (漢)司馬遷：《史記·蒙恬傳》(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63)，卷八十八，頁 2565-2566。

³⁵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³⁶ (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引〈過秦論〉，頁 282。

莫大焉。」³⁷。司馬遷認為史學家的職責是將歷代有功德於民族國家的人物記載下來，對道德高尚、學問淵深的聖賢學者，要留下他們的心跡，成為後世的楷模。倘失去此功能，則是史學家的大罪。《史記》在漢朝，不甚流行，沒有學者加以註釋闡述。原稿在西漢後期散佚，現存最早版本，應是六朝時期的殘卷，藏於日本。

班固評《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³⁸原因是《史記》不合當時政府所推的道德標準，不特別宣揚儒家思想，贊美崇尚正義的遊俠，欣賞工商業致富的奇才。因為不能成為當權者的宣傳品，這就被當時政府及士大夫所忽略。

中國古代政府非常害怕私人著述歷史，私人著史，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因為私人著述會將當權的醜惡載於史冊。所以，我們看二十四史所記載的皇帝大都是天縱英明、智慧高超、道德無倫的聖人，每次看見歷代帝皇的廟號，我都有點「太過份」的感覺。

現代歷史教學，減弱了道德的元素，著重史事的正確性，再加以現代道德的評判。但無論歷史教學如何的變，也不可忘記史遷所說的史家責任。陳勝被列入世家，是平民反對暴政的首義，足法於後世；孔子列入世家，喻其萬代而不衰；呂后列入本紀，是明確了她的統治實權，諸事評論見於《太史公書義法》³⁹。一褒一貶，皆有所據。往後的正史中，誰人是循吏，誰人是酷吏，都反映當時對官員的要求。

北魏孝文帝漢化，使漢族與鮮卑融和，固然有益於民族統一，但相對於鮮卑文化，可以說是一次災劫。馮道歷五朝八姓十三君，被稱無恥，但他大規模官刻儒家經典，不過問財政軍事，又是另一個存著爭議的歷史評價問題。

歷史，第一考慮是史事內容正確與否，第二歷史評價中肯度。評價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道德標準，也看到普遍價值觀。同時，亦是政府推展社會道德趨向的工具。西漢流行五德終始說，王莽因勢居攝帝位。不論他的弊政如何，他曾是數十萬人擁戴的賢士，終生儉樸。假設王莽成功治國，又會是另一新局面。王莽被稱「篡漢」，並以「偽」稱其人，都與東漢崇尚節氣的社會氛圍有關，這些都歷史教學的難處。

再者，歷史編寫的一字一句，都可以具有巨大的意義與影響力，例如，是黃巢起義，抑或是黃巢之亂；是流寇之禍，並是流民之變。足以反映編寫者的

³⁷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零〈太史公書自序〉，頁 3299。

³⁸ (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 2737-2738。

³⁹ (清)孫德謙：《太史公書義法》收在劉咸沂：《四史知意》(台北：鼎文書局，1976)。

取態或當權者所希望灌輸的概念。鄭樵曾說：「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

人」，說的就是真實地面對歷史。

歷史，不單重視史實，亦是道德教育。筆者感到憂慮的是，國人對道德的掌握與衡量，好像失去了標準。

原載於《新亞論叢》2020年